

◀ (上接2版)

们不鼓励推论、联想的功夫，所以觉得东京学派常常显得有过度想象的缺点。斯波还在大阪的时候，当然不免会让人家觉得他应该会与京都学派有所往来。但是他的治学方法显然与所谓的“京都学派”互有扞格。另一方面，如果说他是东京文献学派的一员，那么就他重视方法论的特色言之，他又似乎没有反映出“东京文献学派”的特质。怪不得他在2015年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完全抛弃“学派”的架构，而就法制史及社会经济史来讨论日本的东洋史学。对他来说，史学研究当然不能不讲“实证”（就是兰克的史学），建筑在文献的考证上面，但是显然这只是基本功夫，史家一定要进一步使用专门的学问或辅助科学，来处理诸如法制、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历史。总之，把斯波划入“东京文献学派”不是合宜的做法。

1988年，日本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件争议。京都大学退休教授佐伯富以《中国盐政史研究》被提名学术院赏。结果早稻田大学教授（也已经退休）藤井宏跳了出来批评，说佐伯富的巨著是抄袭他更早的一些文章（主要是有关明代徽商的研究）而成，根本不算原创，更是剽窃藤井自己的作品云云。这件事引发了不小的风波。1989年我正好去了东京，到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去看斯波。由于我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竟然在他的办公室当着东大的一些学者学生面前问起这件事。当时斯波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顾左右而言他。事后他请我去吃饭，才告诉我说这件事背后有两校之间长久积累的矛盾，所以我提起它，他会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知从何说起。坐在东大办公室，当着东大的同事学生面前，斯波并没有直接捍卫藤井，可见他对学术分野的公正态度。那一年，佐伯先生依然获得学术院的恩赐赏。

斯波先生的学生很多，我没有特别留意，但是知道现在东大中国思想史教授的小岛毅就曾经受益于他的教导。由于小岛教授后来跟随沟口雄三研究思想史，所以他也受到斯波指导的事比较没有受到注意。事实上，小岛在2000—2005年间主持一个文部省支助的“东亚海域文化交流与日本文明的起源”大型计划（大意如此，正确原名一时记不起来；常常简称为“宁波计划”），获得多过日币十亿以上

的拨款，参与计划的伊原弘教授得意得很，对我说，用一般手掌上的计算机竟然没法运算。说时还手足舞蹈，可见当时获奖的兴奋。这个计划便充分反映了斯波在学术上的影响。我有幸受邀担任这个计划的国际顾问，每一年飞到东京去咨询和接受报告。事实上，1985年，小岛毅和夫人还在北京做研究时，便曾应斯波先生的吩咐到香港玩时要顺便来看我。没有想到今天小岛教授已是一方之主，执日本中国研究的牛耳。我特别记述他与斯波先生在学术上的因缘，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斯波先生的直接、间接影响。

2003年，小岛毅给我写了信，要我准备参加他计划每年一次的大会，同时告诉我斯波先生已经膺选为学士院的院士，要在我到东京时用计划的名义替他开一个庆祝餐会。我能参加这个餐会，确实感到非常难得而兴奋。这时斯波先生已经是东洋文库的“文库长”。所以我也趁便去文库（其实我早在1978年便已经去过，当时还在旧址，由生田滋教授安排）参观，在那里接受他亲自招待。那天，我也再一次见到田仲一成先生。田仲先生曾长期在香港作田野考察，研究“中国的演戏”，是另一位我非常佩服的学者。我记得陪我的小岛先生指出文库附近的一条街叫做“不忍通”，说这是出于《孟子》，并说日本许多街道、商店名（像“三省堂”，“后乐园”都取材于中国的经书云云。我当然知道这个，但是取用“不忍”，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想不到吧。

斯波后来的研究又拓展到都市史。现在做中国（特别是唐代）城市史的第一把交椅的是中央大学的妹尾达彦。他就是斯波先生在大阪大学任教时的高足。

我最近一次与斯波先生见面是在2008年，他应邀来合作学术演讲。当时我刚到台湾交通大学。接待他，我自然不遗余力。我们谈起学术院种种，他说基本上他是接了江上波夫的遗缺。因为按照学术院的规矩，员额控制在80人，所以没有院士过世，就无法补人。可见其获世人荣宠的理由和程度。有趣的是，江上波夫的名著是《骑马民族史》，主张日本人种的起源来自蒙古、朝鲜或西伯利亚。斯波先生研究中国文明如何往南移转，以及中国东南海岸与东南亚的交流，这里头可能隐含的ニュアンス(nuance)就留待大家猜测了。

谨以此文恭贺斯波先生实至名归的唐奖荣誉。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

哈贝马斯：我仍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

编译/缪济

89岁生日的前夕，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施塔恩贝格的家中接受了《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访问。《文汇学人》在此摘编部分访谈，除了能一窥这位当世最重要思想家的书房，还能从他谈民族主义、移民、互联网和欧洲等话题中，读到他不掩饰的愤怒、不解和失望。

哈贝马斯的家位于距离慕尼黑大约50公里的施塔恩贝格湖畔，在一排排的阿尔卑斯小木屋中，醒目地矗立着一座有着巨大窗户的白色建筑物。在建筑学的角度下，这就像是在海蒂的故乡看到了理性主义，抑或是包豪斯风格与巴伐利亚坚定保守主义的并存。在这座建筑的蓝色大门上，有着一块白色小匾，匾上证实了这正是这位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的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家。即便在他即将89岁之际，他仍旧有着惊人的学术产出，使其拥有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这一神圣称号。

和哈贝马斯已经结婚60多年的妻子，历史学家乌特·韦塞尔霍夫特(Ute Wesselhoeft)为我们开了门，迎面看到一条狭窄的走廊，只听乌特对她的丈夫说道：“尤尔根！西班牙的记者们来了。”乌特和尤尔根自1971年起就住在这里，也是自那时起，哈贝马斯成为了普朗克研究所的所长。

哈贝马斯，这位西奥多·阿多诺的门徒和助手，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教授出现在一间有些杂乱的、堆着成堆论文和书籍，窗户正对着森林的房间里，他说这是他的书房。

这是一间以白色和赭色为主调装饰的书房，房中摆放着一些现代艺术的收藏品，包括有汉斯·哈顿(Hans Hartung)，艾德瓦尔多·奇立达(Eduardo Chillida)，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和根特·弗鲁特朗克(Günter Fruhtrunk)的画，以及豪尔赫·奥泰萨(Jorge Oteiza)和胡安·米罗(Joan Miró)的雕塑，其中胡安·米罗的雕塑是他在2003年获得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社会科学奖(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for Social Sciences)的

奖品。书架上陈列着歌德、荷尔德林、席勒和冯·克莱斯特的著作集，以及大量包括有恩格斯、马克思、乔伊斯、布洛赫、瓦尔泽、赫尔曼·黑塞和君特·格拉斯的作品。

作为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重要著作的作者，哈贝马斯向《西班牙国家报》谈起过去60年间他一直关注的问题。他的体态挺拔坚硬，握手坚定有力，尽管一头白发衬托出他如祖父般的慈祥之感，然而说起话来却非常铿锵有力：“是的，我仍旧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这并不是件坏事，不是吗？”

由于撕裂的关系，哈贝马斯在说话上有些困难。但正是由于他与说话的斗争促使他更深层次地思考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这是治愈社会部分弊病的一种手段。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曾经一度有些无奈地望向窗外，自言自语道：“我已经不再喜欢大的礼堂或是房间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刺耳的喧嚣让我感到绝望。”

让我感到恼火的一点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首要为经济服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新媒体革命

如今有很多议论都在说知识分子正在节节败退，您认为这个说法公平吗，即这类议论几乎一直仅限于知识分子的范畴？

哈贝马斯：根据法国模式，即从左拉到萨特和布迪厄，公域对于知识分子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它脆弱的结构正在加速其衰弱的过程。而这个古老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究竟

去哪了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那些可以向他们传递想法的读者们，何谈知识分子的责任呢？

互联网是否削弱了支持传统媒体的公域，也对哲学家和思想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哈贝马斯：是的。自从海因里希·海涅以来，知识分子的形象就随着自由主义公域的经典形成一同构建了起来，并且取得了其应有的社会地位。然而，这取决于不怎么合理的社会和文化假设，例如有警醒式的新闻，参考类的报纸和大众传媒能够将大众的兴趣成功引向有关政治观点形成的话题。同时，还要存在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读者，他们受过教育，习惯于观点形成的冲突过程，并且愿意花时间阅读高质量的独立报刊。

然而如今，这样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完好无损。尽管据我所知，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还保有得不错。但是即便在那里，互联网的碎片效应仍旧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角色，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在新媒体的离心作用和原子效应起效之前，公众关注力的商业化已经触发了公域的解体过程。美国的有线电视频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的新型通信手段有着更为狡猾的商业模式，其目的并不在于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私人信息经济开发，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他们的个人信息，以此来更好地操纵消费者，有时候甚至有着不正当的政治目的，例如最近的Facebook丑闻。

所以尽管有着明显的优势，您认为互联网是在鼓励一

(下转4版) ➔